

* 元代經學專輯 *

吳澄小論

福田殖*著 連清吉譯**

一

吳澄（1249-1333）與許衡（1209-1281）並稱為元代二大儒。此一稱謂，至今仍然被認可的。清乾隆年間完成的《四庫全書總目》不但承繼許衡與吳澄為二大儒的見解，更進一步地比較分析二大儒的學問內容：

初，許衡之卒，詔歐陽玄作〈神道碑〉。及澄之卒，又詔揭傒斯撰〈神道碑〉。首稱「皇元受命，天降真儒。北有許衡，南有吳澄。所以恢宏至道，潤色鴻業，有以知斯文未喪，景運方興」云云。當時蓋以二人為南北學者之宗。然衡之學，主於篤實以化人；澄之學，主於著作以立教。故世傳魯齋遺書僅寥寥數卷，而澄於注解諸經以外，訂正張子、邵子書，旁及《老子》、《莊子》、《太玄》、《樂律》、《八陣圖》、《葬經》之類，皆有撰論。而文集尚裒然盈百卷。衡之文，明白質樸，達意而止；澄則詞華典雅，往往斐然可觀。據其文章論之，澄其尤彬彬乎。①

就學術文章而言，吳澄無疑是元代最偉大的儒者。揭傒斯於〈吳公神道碑〉中，亦敘述了許衡與吳澄於元代對發揚傳統儒學，即聖賢之學所做的貢獻：

然金亡四十三年，宋始隨之。許公居王畿之內，一時用事，皆金遺老，得早

* 日本久留米大學文學部教授。

** 日本長崎大學環境科學部副教授。

① 《四庫全書總目》卷 166，集部 19，別集類 19，頁 37-38 《吳文正集》100 卷。本文所採取的版本以明成化 20 年刊《吳文正公集》49 卷、《外集》3 卷（《元人文集珍本叢刊》，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為主，並參考《四庫全書珍本》二集所收《吳文正集》200 卷及乾隆 20 年崇仁縣訓導萬璜刊本《草廬吳文正公集》49 卷。

以聖賢之學佐聖天子，開萬世無窮之基，故其用也弘。吳公僻在江南，居阨危之中，及天下既定，又二十六年，始以大臣薦，強起而用之，則年已五十餘矣。雖事上之日晚，而得以聖賢之學為四方學者之依歸，為聖天子致明道敷教之實，故其及也深。②

元王朝是由多民族所形成的國家，主要的有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南人的地位最低。所謂漢人、南人，是指金、南宋的遺民，即被征服的民族。漢人又稱為北人，地位較南人為高。南人備受歧視，以仕宦而言，每以南人為理由而採取差別措施③。許衡為北人，活躍於元初；吳澄為南人，對於元代後半期的學術思想界有極大的影響。其影響力不僅止於南人，也及於北人，故有「四方學者之依歸」的稱譽。元代儒者的社會地位極低；但是許衡和吳澄卻不在意一般所謂「一官、二吏……九儒、十丐」④的序列，極力主張以「聖賢之學」（儒學）來輔佐天子、闡明道學，誠值得贊佩。再者，歷來以為元代是異族統治的黑暗時代，並沒有特別值得論述的思想家出現⑤；但是許衡繼承朱子學的傳統，架構元代朱子學盛行的基礎，其學說

② 《吳文正集》（《四庫全書珍本》二集）附錄。

③ 據《元史》卷172〈程鉅夫傳〉所載：「又命為御史中丞。臺臣言：鉅夫南人，且年少。」又《元史》卷181〈元明善傳〉所載董士選的議論：「復初，中原人也，仕必當道。伯生，南人，將為復初摧折。」

④ 元代儒者地位極低。參謝枋得：〈送方伯載歸三山序〉（《疊山集》卷6）。

⑤ 〔明〕丘濬：《世史正綱》卷32：

入元以來，歲下之圖，皆塗以黑〔……〕中國為陽，夷狄為陰〔……〕百年之間，中國淪於夷狄，人類同於禽獸，可嘆也哉。

即以元代百年為黑暗時代。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則說：

嚮《詩》、《書》、《禮》、《樂》於〔非〕類之廷者，其國之妖也。其迹似，其理逆，其文詭，其說淫，相帥以嬉，不亡也奚待？虞集、危素祇益蒙古之亡，而為儒者之恥，姚樞、許衡實先之矣。（《讀通鑑論》卷17）

王夫之又說：

宋末元胡之世，名為儒者，與聞格物之正訓，而不念格之也將以何為？（同上）

王異類者愚，其流毒慘哉。（同上，卷6）

即以「夷狄」蹂躪「華夏」的元朝是黑暗時代，儒生不得仕宦。武內義雄的《中國思想史》與宇野哲人的《支那哲學史——近世儒學》都沒有記述元代思想。森三樹三郎的《中國思想史》則說：元代百年間，可以說沒有值得特別論述的思想家出現。但是本田成之的《支那近世哲學史話》則有「元代的學者」（「元代の學者」）、狩野直喜的《中國哲學史》有「元代的哲學」（「元代の哲學」）、楠本正繼的《宋明時代儒學思想の研究》有「元代儒學」、秋月胤繼的《元明時代の儒教》有「元代的儒教」（「元代の儒教」）的篇章，對元代的學術做詳細地論述。

又影響到明初朱子學者曹月川、薛敬軒等人。吳澄早歲以繼承朱子道統為志向而鑽研朱子學；後來由於重新評估鄉里先賢陸象山的學問價值，乃轉向朱、陸融會的學術立場。此一思想宗向乃為明陳白沙、王陽明的先驅。此為探究元代學術思想，最值得研究者。許衡為朱子學者，這是學術界的通說。但是，對於吳澄的評價則眾說紛紜。在吳澄在世時，或以為其學問為程、朱學^⑥，或批評其為陸學^⑦。後世亦有歸之於陸學的^⑧。但是其朱、陸融合，甚至是「宗陸背朱」的學術性格，至今尚未見較肯切的評論^⑨。本文擬就吳澄的生涯及其學問的立場，做一番考察。

二

有關吳澄傳記的基本資料，有門人虞集的〈吳公行狀〉、晚年弟子危素的〈吳公年譜〉（以下簡稱〈年譜〉）、揭傒斯的〈神道碑〉、《宋元學案》卷 92〈草廬學案〉和

⑥ 據〈年譜〉所載：元貞元元年，吳澄四十七歲。元明善向吳澄請執弟子禮而學程、朱之學。

⑦ 據虞集的〈行狀〉：皇慶元年吳澄六十四時，議者以吳澄的學問為陸學，欲加排斥，吳澄以故而辭去國子司業的官職。

⑧ 參考李紱：《陸子學譜》卷 18，〈私淑上〉。

⑨ 據任繼愈編：《宋明理學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卷上。說：「總的說來，饒魯在理學上，固然屬朱學範圍，但也夾雜有陸學的東西。」「饒魯之後，其學傳至吳澄。吳澄在融會朱、陸中，比起饒魯來說，走得更遠一些，以至有『宗陸背朱』之嫌。」（第 26 章第 1 節）又：

元代的朱學人物，除了那些墨守師說的人以外，都在不同程度上兼取陸學的本心論，而蔚為一時的「風會」。吳澄、許衡、許謙、宋濂等，這些朱學人物，與「由陸入朱」的史蒙卿、鄭玉不同。史蒙卿、鄭玉是以陸學的本心論，兼取朱學致知、篤實的下學工夫。而吳澄、許衡等人，是以朱學兼取陸學的本心論，他們不僅持有朱學致知篤實的工夫，而且也還保持朱學的理氣論與理欲之辨。這種「和會朱、陸」的內容，對於後來王學的出現有一定的關係。（第 27 章第 2 節）

唐宇元的：〈吳澄的理學思想〉（《中國哲學》第 8 輯〔1982 年 10 月〕）也採取相同的論調。錢穆的〈吳草廬學述〉則說：

草廬雖遵朱學，而非薄陳、饒，可視其為學之一面。

又：

草廬經學，明承兩宋理學，與此下清儒治經有辨。而其《五經纂言》之規模與綱宗，實一本朱子。

又：

後世論學者，乃以草廬為調和朱、陸，或竟以為陸學，則殆所謂皮相之見也。草廬之學實確然仍為朱子之學統。

《元史·吳澄傳》等。其中〈行狀〉的記述最為詳細，〈年譜〉簡而扼要。茲參考上述諸記載，概述吳澄的生平事蹟於下。

吳澄（澂），字幼清，晚年稱伯清，號草廬，撫州路崇仁縣（今江西省）人。高祖以來，世代皆舉進士。南宋淳祐9年（1249）正月19日生，即朱子死後四十九年。與同門程鉅夫、劉因同年。長於殉死南宋的文天祥十三歲；長於陸秀夫十一歲。

吳澄少時聰明，學問方面主要是受到祖父吳鐸^⑩的薰陶。吳澄說：

澄生五年而讀書，七年而能聲對，九年而能詩賦，十有三年而應舉之文盡通。當是之時，不知科舉之外他有所謂學也。年十五六，始恍然有悟於聖經賢傳之中，始知科舉不足以爲吾學。^⑪

又說：

澄生十有九年矣，家貧不能從師，惟大父家庭之訓是聞。幼年頗以能屬文而見知於人，然當時所能者，舉業而已，未聞道也。年十有六始知舉業之外，有所謂聖賢之學者，而吾未之學。於是始厭科舉之業，慨然以豪傑之士自期，必欲爲周、程、張、邵、朱，而又推此道，以堯、舜其君臣而後已也。^⑫

景定5年秋，吳澄十六歲。祖父赴郡城應鄉試，吳澄亦隨行。於臨汝書院詣見程若庸，此後常往來程氏門下。程若庸，字逢原，號微庵、勿齋，休寧（安徽）人。隨饒魯、沈貴珣研習朱子學。著有《性理字訓講義》、《太極洪範圖說》。又有《增廣性理字訓》一書，乃推衍程端蒙《字訓》三十條爲六門、百八十三條。陳櫟推崇此書說：「學朱子之學，精到如程勿齋者甚少，此公才質鈍，只見勤。文頗絮煩，然學問精到，絮煩得好。」^⑬即評述程若庸學問的特色。由《宋元學案》的記載，可知吳澄師承關係爲「朱熹——黃榦——饒魯——程若庸——吳澄」。此時吳澄又結識程若庸的族人程鉅夫，於吳澄日後出處進退有極大的關連。

根據〈年譜〉的記載，吳澄十歲時偶得朱子《大學中庸章句》，讀之欣然大悅。

^⑩ 據〈年譜〉所載：吳澄的祖父吳鐸「精通天文星曆之學，寬厚不屑細務」。關於此點，錢穆說：「鐸之爲學，必有得於康節。故草廬早歲即留心《皇極經世》之書。」又關於其父吳樞的事蹟，〈年譜〉記有「溫粹純實，謙退不與人爭。善爲方里，嘗大札，業醫者多畏傳染，不敢往視。或盡室不起，乃煮善藥，命一力持以自隨，給以飲之，全活者數十家」的一段美談。

^⑪ 明成化20年刊《吳文正公外集》卷3，〈謝張教〉，22歲時的文章。

^⑫ 同上，〈謁趙判簿書〉，作於19歲。

^⑬ 程若庸的生平事蹟，見於《宋元學案》卷83〈雙峰學案〉；《宋元學案補遺》卷83；《四庫提要》卷95，子部5，儒家類存目1《性理字訓》1卷等。

十五時嫌惡制舉應試的科目，傾注心血於聖賢之學。讀朱子訓子帖而作〈勤〉、〈謹〉二箴和〈敬〉、〈和〉二銘。所謂「聖賢之學」即是中國傳統的儒學，更具體地說，就是繼承孔、孟之道的宋代新儒學。此時吳澄的學問就是朱子學。至於吳澄是如何治學的，吳澄說：

嘗求一人焉以與之共學，而不可得也，是以私淑經而無所師，獨學於家而無所友。（《吳文正公外集》卷3，〈答程教講義〉）

乃獨學而無師友以共勉。即在知遇於朱子學者程若庸之前，吳澄對朱子學的理解，全是獨學而成。然則吳澄為何會傾心於朱子學，此與吳澄鄉里的學問傳承有密切的關係。朱子的高弟黃榦於嘉定3年（1210）赴任臨川，傳授縣人朱子學。其學風乃流傳至後世^⑭。再者，北宋王安石、南宋陸象山皆出生於臨川，這對吳澄學問的形成也有深遠的影響。

由於往來程若庸的門下，使吳澄對朱子學有更深刻地理解。特別是正值抗拒科舉應制而關注「聖賢之學」的時期，吳澄於十九歲時，表現出極度熱衷於學問的情形。依據〈年譜〉的記載，吳澄於咸淳3年，即十九歲時，作〈道統圖〉並敘^⑮，校正《孝經》，作〈外傳〉十篇（已亡佚），又作〈皇極經世續書〉（亡佚）。

吳澄未必只是將朱子學尊奉為金科玉律，乃繼承朱子的精神，實現朱子集北宋諸子學問大成的事業。吳澄傾注一生心力於《五經纂言》的完成，其中《三禮》即是繼承朱子未完成的名山之業。因此，全謝山說吳澄於此「用功最勤」（《宋元學案·草廬學案》）。

虞集的〈吳公行狀〉記錄著吳澄十九歲時的論說：

道之大原出於天，聖神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魯鄒，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義皇其元，堯、舜其亨乎？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也，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為今日之貞乎？未之聞也。然則可以終無所歸哉？蓋有不可得而辭者矣。

志向遠大而氣宇非凡。「元亨利貞」源出《易經》，吳澄以之為道統論歷史推移的軌

^⑭ 《吳文正公集》卷20，〈臨川縣學記〉。

^⑮ 《吳文正公外集》卷2，〈雜識〉、〈十道統〉，十九歲時作。

跡。此或受到邵雍《皇極經世書》所謂「元會運世」，即論時間推移觀念的影響。再者，吳澄以為近世道統終於朱子的「利」，自身則為繼朱子之後的「貞」的位置，足見其頗為自負。

〈吳公行狀〉（以下簡稱〈行狀〉）又收載著吳澄十九歲時所寫的書信^{①⑥}。其中，吳澄以為孟子以後千有餘年，未有一豪傑之士出；至宋，周、程、張、邵等豪傑之士，一時輩出。其後百年，朱子出而集北宋諸子的大成，是為中興之豪傑。自身亦以豪傑自許，欲闡揚聖賢之學，致天子於堯、舜之匹配。吳澄將「豪傑之士」定義為「度越一世、超出等夷（同輩）」，即表現出其超越俗學的理想壯志。虞集推崇吳澄的胸臆說：

是時先生方弱冠而有志自任如此。其後先生嘗識此二文之後，曰：「其見多未定之見，其言多有病之言。然不忍棄去，錄而藏之。」則晚年所進，自此可攷矣。（〈行狀〉）

可知吳澄並不甘居於朱子之亞流；乃以繼承朱子的精神，超出俗流俗學而成豪傑之士自許。此高邁的志向，吳澄是終生奉行不輟。《元史·吳澄傳》亦載記上述吳澄以朱子為近世道統「利」，自身繼承朱子而為「貞」一節，稱揚吳澄「其蚤以斯文自任如此」。《宋元學案·草廬學案》亦於小傳中引述此文，強調吳澄任重道遠的胸懷大志。

清李紱（1673-1759）也推崇吳澄為一代大儒。然則就學問宗尚而言，吳澄先尊奉朱子學，晚年則祖述陸子之學，故李紱指摘《元史·吳澄傳》有關吳澄尊朱的論述是誤謬的。李紱說：

按：《元史》撰於明初，總其事者，為宋文憲、王忠文二公。其論議本於金華四先生，故吳文正公此傳，引用公元、亨、利、貞之說，意在於尊朱，其實此特弱冠之說，不足以定文正公之學。必如晚年所作〈尊德性道問學齋記〉，乃足窺公所學之歸宿，確在於陸子。而鑽研文義之學，則皆公所深悔，謂為墮此窠臼垂四十年而始覺其非者也。^{①⑦}

即以吳澄私淑陸子，如所作〈尊德性道問學齋記〉^{①⑧}、〈象山先生語錄序〉^{①⑨}、〈仙

^{①⑥} 同註^{①⑤}，卷3，〈謁趙判簿書〉。

^{①⑦} 《陸子學譜》卷18，〈私淑上〉，《元史·吳澄傳》按語。

^{①⑧} 《吳文正公集》卷22。

^{①⑨} 同前註，卷10。

城本心樓記》^⑩、〈送陳洪範序〉^⑪，皆以陸學為學問的極致。雖然如此，〈年譜〉所載：吳澄七十歲作《書纂言》、七十四歲作《易纂言》、八十一歲作《易纂言外翼》、死前一年，即八十四歲完成的《禮記纂言》的《五經纂言》，乃繼承朱子之後而撰述的經學著作。再者，〈答田副使第一書〉、〈第二書〉、〈第三書〉^⑫是吳澄晚年的書信，其中對於周敦頤《太極圖說》「無極而太極」的解釋，則不從陸子而從朱子之說。不但如此，吳澄更明白地指陳：朱子為周子之忠臣，自己的學問則在發明朱子之說。關於這一部分，李紱或許輕忽了。

增補《宋元學案》的全祖望，在〈草廬學案〉的序文中說：

祖望謹案：草廬出於雙峰，固朱學也，其後亦兼主陸學。蓋草廬又師程氏紹開，程氏常築道一書院，思和會兩家。然草廬之著書，則終近乎朱。述〈草廬學案〉。

以實證的精神，客觀地評述吳澄學問的宗尚。全祖望以為李紱的才學是黃東發（震）以後的傑出之士。於雍正 11 年二十九歲時，曾四度以書信和李紱討論〈陸子學案〉的問題。全祖望以為李紱的《陸子學譜》有甚多宜加斟酌的所在；但是李紱並不參採全祖望的見解，並說：「欲為遠大之業，補亡訂誤雖有小補，未有大益。」全祖望之所以修補《宋元學案》，乃受到李紱《陸子學譜》所影響^⑬；雖然如此，其對吳澄的評價卻未必與李紱相同。〈草廬學案〉所採錄有關吳澄的資料，就較《陸子學譜》廣泛精詳，足以窺知吳澄學術思想的全貌。此為〈草廬學案〉值得稱揚的所在^⑭。吳澄以朱子學為治學的基本，其後包攝陸子精微之處。換言之，吳澄的學問是朱、陸融合，而非捨朱歸陸。至其晚年仍以朱子後人自許，竭盡心力於經典精義的闡述。吳澄執著於儒家經典的學問態度，乃確立於十九歲問學於程若庸之時。

三

⑩ 同前註，卷 48。

⑪ 同前註，卷 15。

⑫ 同前註，卷 3。

⑬ 李紱與全祖望的關係，參考《宋元學案·考略》所引《鄞縣志·人物傳》、全祖望弟子董小鈍編輯的〈謝山先生年譜〉及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 7 章〈李穆堂〉。

⑭ 同註⑩，錢穆的〈吳草廬學述〉。

南宋咸淳 6 年 8 月，吳澄中鄉試，時年二十二。翌年 7 月春，省試落榜。鄉試合格時，吳澄寫給授業先生的書信表示：十五、六歲時讀聖賢書而有志於聖賢之學。今（咸淳 6 年）秋受父命應鄉試，因此無法專致於聖賢之學。不受科舉之累而專心於聖賢之學，乃是終身的志願。至於以中舉登科為一生的事業，是鄙人的俗念，自身則引以為恥²⁵。

咸淳 6 年，二十二歲之時，值得注目的是吳澄與程紹開的相遇。〈行狀〉、《元史》、〈神道碑〉都沒有涉及程紹開的事。〈年譜〉二十二歲的條目中，也只記載〈答程教書〉而已。《宋元學案·草廬學案》雖明言「草廬又師程紹開」，卻沒有記述二人何時往來。《吳文正公外集》卷 3 收錄有「謝程教書」的書信與程氏的回函。又有〈從事郎宣差撫州州教授兼臨汝書堂山長暫權通判程某劄子〉與〈答程教講義〉。〈謝程教書〉如是敘述著：

澄嘗謂：孟子沒而道學不得其傳，自我朝程夫子出而後有以接夫千載不傳之緒也。澄也厭科舉之業，而欲學夫子之學久矣，嘗恨不得生乎其時，游乎其門，願徒私淑艾於遺編，而想慕於異世，雖夢寐間，如或見之。蓋今之世有程其氏者，亦莫不願識其人，以少慰予心之所思。今先生職教於吾邦，澄也一覩先生之姓，恍然若河南二夫子之復出於今也。

吳澄或於此年的 10 月與程紹開相遇的。信中也指出程紹開的學問乃是以宋學的「心性論」為主體，而自己的：

所願則學程夫子。先生同姓之人也，家世所傳，果亦有異聞者，願以教我之不備。

〈答程教講義〉為吳澄二十三歲所寫的。此針對程紹開講述《孟子·告子上》十七章「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而回復的書信。吳澄說：

今先生乃推夫子與進互鄉之心，曉之以義理。愚也伏讀三數，不覺惻然有契於心者焉。思欲有言而不知所以為言也。聊誦所聞如此。

並呈獻所作《私錄》二集、《孝經定本》一篇、〈外傳〉十篇、〈皇極經世續書〉一篇、《書經·秦誓》一篇與《春秋·隱公》一、二年的草稿，懇請程紹開誨正。足見其對程氏尊敬之情。

程紹開（1212-1280）字及甫，號月巖，廣信貴溪（今江西省）人。如果吳澄二

²⁵ 《吳文正公外集》卷 3，〈謝程教〉。此信乃寫給程紹開的，文中充滿對程氏尊敬之情。

十二歲與程氏相遇，則程氏時年五十九。程氏嘗築道一書院而融合朱、陸之說，王梓材受其學而說：「程氏嘗築道一書院，思和會（朱、陸）兩家。據此，則先生本為陸學而和合朱學者也。」²⁶全祖望則說：「晦靜（湯巾）由朱而入陸，傳之東澗（湯漢）。晦靜又傳之徑畹（徐霖）。楊、袁之後，陸學之一盛也。」²⁷即程紹開的學問與徐霖的弟子徐古為（直方）相契合。程氏講學於臨汝外，又為象山書院山長。黃東發（震）品評程紹開為「天資端恪而學力深醇」²⁸。

吳澄於十九歲的書信中，除自許繼承朱子的傳承，以聖賢之學為志向而成為豪傑之士外，也兼及鄉土先賢王安石、陸象山的評述：

嘗謂我臨川之邦之前後人才，有之荆公之為人，非常人也，然與程子同時而不與程子同道。有陸象山之為學，非俗學也，然與朱子同時而不能與朱子同道。吾此為懼。²⁹

此時或隱藏著朱、陸融會的契機，故知遇於程紹開時，即能理解陸學的特質。雖然如此，吳澄能明白指陳陸學本心論的特色，則是日後的事。

虞集的〈行狀〉敘述吳澄會試落榜的情境說：

纂次舊作，謂之私錄。時宋亡之證已見，先生以其道教授鄉里，嘗作草屋數間，而題其牖曰：「抱膝〈梁父吟〉，浩歌〈出師表〉。」程文憲知其意，題之曰「草廬」。

咸淳 8 年至 10 年，即二十四至二十六歲時，吳澄以聖賢之道教授學徒。

元至元 12 年，吳澄的故里撫州歸順元朝，時年二十七。南宋丞相文天祥起兵廬陵以抗元，各地郡縣紛紛響應。是時盜賊橫行，吳澄為奉親避賊，始終居留草廬，以故不能隨文天祥殉死南宋³⁰。在忠孝難以兩全的情況，吳澄的選擇是事親盡孝一

²⁶ 《宋元學案》卷 84，〈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²⁷ 同上，〈存齋晦靜息庵學案·序〉。

²⁸ 《宋元學案補遺》卷 84。

²⁹ 《吳文正公外集》卷 3，〈謁趙判簿書〉。

³⁰ 吳澄會試合格而授任南宋官職，其或殉宋亦未可知。文天祥長吳澄十三歲，科舉狀元及第。廣瀨旭莊論曰：「文天祥為宋而死，其弟璧奉母降元。天祥曰：『文氏數十世，吾始仕宦，以吾一身報國足矣，我家不可斷絕。』是所謂忠孝雙全者。」（《九桂草堂隨筆》卷 1）敘述文氏兄弟出處進退之不同所在。文璧降元之事，頗受非難，詳記於史冊。吳澄仕元而為翰林學士，明丘濬即激烈的指責說：

濬（吳澄）宋朝之鄉貢進士也，平昔所志者何道也？仕之所得幾何？頓忘孔子《春秋》之教。（《世史正綱》卷 32）

途。

至元 16 年，南宋滅亡，吳澄時年三十一。根據〈年譜〉的記載：翌年（即至元 17 年）吳澄「隱居布水谷」，直到至元 20 年，三十五歲的期間，都定居於此。此四、五年間，吳澄專注於群經的注釋，著《孝經章句》，校定《易》、《書》、《詩》、《春秋》，考訂《儀禮》、《小戴》、《大戴記》。三十五歲時，由布水谷歸返故鄉撫州。翌年 5 月，父歿，吳澄守喪三年，時年三十八。此年友人程鉅夫奉詔到江南廣求人才^①。翌年春，吳澄伴母游夫人上京，12 月還家。此行雖以觀賞中原山川形勝為由，其實是程鉅夫極力地勸誘吳澄仕宦元朝。吳澄知曉實情，乃急遽返鄉（編按：事實上，吳澄早知程氏之意而拒絕，而程氏乃以：「誠不肯為朝廷出，中原山川之勝，可無一覽乎？」答之，故有此遊，然此段大有問題。）。程鉅夫知道吳澄無意仕元，乃向朝廷上奏，請將吳澄校定的《易》、《書》、《詩》、《春秋》、《儀禮》、《大戴記》、《小戴記》置放於國子監。朝廷應准，吳澄於四十一歲將校定的群經進呈朝廷。吳澄精通群經的聲名乃知聞一時。此於吳澄日後的出處進退有深遠的影響。

元貞元元年，吳澄出遊豫章西山，時年四十七。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經歷郝仲明向吳澄請教《易經》，提出疑問數十條。此事載於〈原理〉^②一文中。〈年譜〉記載著：此時「朔南士友問學者眾」。可知南人、北人皆注目吳澄的存在。其中北人元明善向吳澄提出經書疑難數十條，尤其以《春秋》為最多。元明善敬服於吳澄明快的解疑，請執弟子禮。並指出「先生所學，程、朱二子所學也」（〈年譜〉），即以吳澄的學問是程、朱學。

翌年，由於元明善的引介，吳澄認識了董士選。董士選贊許吳澄為「德睿嚴厲而不失其和」。與董士選的相交，導致吳澄出仕元朝的結果。

四

大德 2 年，董士選極力推薦吳澄，由於主事者遽亡而不能實現。大德 5 年，在

^①《元史》，卷 172，〈程鉅夫傳〉。

^②《吳文正集》卷 1 所收。跋文曰：

往年因郝仲明見問，一時答之之辭如此，聽者不能悉記吾言，故命史從旁書之，皆先儒之所已言，非吾之自言也。〔……〕

跋文寫於七十九歲時，以朱子、邵康節的學說為主。

御史中丞董士選的引介下，吳澄被授命為應奉翰林文字、登仕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第二年吳澄赴京師，時年五十四。這是吳澄首次出仕朝廷。然而由於代任者已經任職，吳澄乃欲立時返鄉。但因爲黃河結凍，翌年春才得成行。其間大夫士人多來問學。

大德 8 年，吳澄授任將仕郎、江西等處儒學副提舉，時年五十六。早在至元 24 年閏 2 月時，江南各路設置儒學提舉司。大德 10 年 10 月，朝廷催促吳澄上任。當時的儒學提舉爲鄭陶孫。〈年譜〉記載吳澄此時的言論說：

公從容言曰：「必欲作成人才，在於教人言忠信、行篤敬，以尊德性而已。」可知此時吳澄的學問或已積極地攝取陸象山以「存心明性」爲核心的本心論。距吳澄十九歲尊奉朱子學，已將近四十年了。吳澄的〈尊德性道問學齋記〉或許就在此前後撰述的。此〈尊德性道問學齋記〉（以下簡稱〈齋記〉）是爲清江（今江西省）的皮潛（字昭德）而寫的。大德 11 年正月，吳澄以病請辭副提舉的官職。此年吳澄校定《老子》、《莊子》、《太玄經》，學問更加博通。6 月行至臨江路（今江西省清江縣）時，以病寄宿在門人皮潛家近百日，10 月始返抵鄉里。在皮潛家停留的期間，吳澄撰寫〈齋記〉。如此文中所謂「墮此窠臼之中垂四十年而始覺其非」，恰可說明吳澄撰述〈齋記〉的時間，而爲吳澄學問歷程的佐證。李紱即以此〈齋記〉而斷定「吳澄始宗朱學，晚年後悔而從陸（學）」^③。

明初程敏政（篁墩）注南宋朱子學者真德秀（西山）的《心經》，刊行《心經附註》四卷時，於篇末節錄了吳澄的〈齋記〉。李朝朱子學者李退溪推崇《心經附註》，於刊行《心經附註》時，附錄所作〈心經後論〉於卷末。李氏對《心經附註》附錄〈齋記〉的事，頗不以然。李退溪說：

〔……〕故平生尊信此書，亦不在《四子》、《近思錄》之下矣。及其每讀至篇末也，又未嘗不致疑於其間，以爲吳氏之爲此說也何見？篁墩之取此條也何意？其無乃有欲率天下歸陸氏之意歟？〔……〕所可疑者，草廬之爲陸學，當時已有其議，後世之公論亦多云云。

即不滿於程篁墩朱、陸早異晚同，即朱、陸折衷的見解。進而以爲「草廬之爲陸學，當時已有其議」。李退溪爲朱子學者，李紱爲陸子學者，二人的學術立場固然不同，以吳澄爲陸學的主張，則是一致的。吳澄之所以辭職退野，與其被指摘爲陸學，是

^③ 《陸子學譜》卷 18。

有若干的關連。據〈年譜〉的記載，至大4年，吳澄授文林郎國子監司業時，進言參酌去取程明道〈學校奏疏〉、胡安定〈大學教法〉、朱子〈學校貢舉私議〉，分別為一經學、二行實、三文藝、四治事以教學的獨特「教法」。然因同列者議論不合，遂有辭官職之志。虞集的〈行狀〉記載翌年，即皇慶元年，吳澄辭去國子監的事情。《宋元學案》的〈吳澄小傳〉、《元史·吳澄傳》亦敘述及之。由此可知，此事是吳澄一生中極為重要的關鍵。茲摘錄〈行狀〉的文字於下：

蓋先生嘗為學者言：朱子道問學工夫多，陸子靜卻以尊德性為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弊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果如陸子靜所言矣，今學者當以尊德性為本，庶幾得之。議者遂以先生為陸學，非許氏尊信朱子之義然為之辭耳，初亦莫知朱、陸之為何如也。

許衡以來的朱子學一尊的思想，乃是國子監的傳統。一旦被指責為陸學，即不能安身於國子司業的官職。或以為北人借朱、陸異同之名而排斥南人的政治問題^{③④}。茲專就學術思想的角度，探究吳澄的學問立場。由於〈行狀〉所載與〈齋記〉論述的一致，因此李退溪斷定吳澄晚年的學問宗尚為陸學。雖然如此，吳澄的高弟虞集並不贊成諸方學者將吳澄歸於陸學的議論。甚至以為議者未必理解朱、陸的本質，但憑膚淺的看法而作表面的議論而已。

虞集於〈行狀〉的後半指出：朱子折衷周、程、張、邵之學而集大成；與陸象山並出於世而體得孟子「先立其大者（心）」（〈告子上〉）的旨趣，「其於斯文互有發明，學者於此可見其全體大用之盛。而（朱、陸）二家門人之區區異同，相勝之淺見，蓋無足論」。虞集此一議論乃繼承吳澄「陸子之學出於孟子」（《吳文正公集》卷48，〈仙城本心樓記〉）、「二師之為教一也，而二家庸劣之門人各立標榜，互相詆訾，至于今日，學者猶惑」^{③⑤}（同上卷15，〈送陳範序〉）之說。即主張朱、陸折衷，朱、陸和會的立場。《宋元學案》也持相同的見解。虞集以為朱、陸於聖賢之道同一其

③④ 朱榮智：《元代文學批評之研究》第1章〈元代之文學環境〉指出：

吳澄以南方之大儒北上，就任國子監司業，北方學者指摘「非朱子之學」，狼狽出都。此明為朱、陸異同之爭，實又為南北儒生之爭。

③⑤ 虞集：《道園學古錄》卷5〈送李擴序〉曰：

近臣以先生薦於上，而議者曰：吳幼清，陸氏之學也，非朱子之學也，不合於許氏之學，不得為國子師。是將率天下而為陸子靜矣。遂罷其事。嗚呼！陸子豈易言哉？彼又安知朱、陸異同之所以然，直妄言以欺世拒人耳。是時僕亦孤立不可留。

較為詳細地敘述吳澄罷官的理由所在。

「全體大用」（確立心的本體而作用於國家社會之具體性的政策）之盛業，於此明晰可見。虞集又指出：超越所謂朱、陸異同的門戶之見，就體現宋學成立之初的理想，即實踐「聖賢之道」的路數而言，許衡與吳澄是相同的。因此，虞集對歧出朱、陸異同的議者，有上述激烈的批評³⁶。

就虞集的〈行狀〉而言，吳澄似乎是捨朱從陸，實則吳澄在批評陳、饒，唯恐

³⁶ 吳澄：〈尊德性道問學齋記〉的全文如下：

天之所以生人，人之所以為人，以此德性也。然自孟氏以來，聖傳不嗣，士學靡宗，誰復知有此哉？漢、唐千餘年間，儒者各矜所長，奮迅馳騁而不自知其缺。董、韓二子，依稀數語近之，而原本竟昧昧也，則亦漢、唐之儒而已矣。宋初如胡如孫，首明聖經，以立師教，一時號為有體有用之學，卓行異材之士，多出其門，不為無補於人心世道。然稽其所極，度越董、韓者無幾，是何也？於所謂德性，未嘗知所以用其力也。逮夫周、程、張、邵興，始能上通孟氏而為一。程氏四傳而至朱，文義之精密，句談而字議，又孟氏以來所未有者，而其學徒往往滯於此而溺其心。夫既以世儒記誦詞章為俗學矣，而其為學亦未離乎言語文字之末，甚至專守一藝而不復旁通它書，掇拾腐說而不能自遣一辭，反俾記誦之徒嗤其陋，詞章之徒譏其拙。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弊而未有能救之者也。夫所貴乎聖人之學，以能全天之所以與我者爾。天之與我，德性是也。是為仁義禮知之根株，是為形質血氣之主宰。舍此而它求，所學果何學哉？假而行如司馬文正公，才如諸葛忠武侯，亦不免為習不著，行不察，亦不過為資器之超於人，而謂有得於聖學則未也。況止於訓詁之精，講說之密，如北溪之陳、雙峰之饒，則與彼記誦詞章之俗學，相去何能以寸哉？漢、唐之儒無責焉！聖學大明於宋代，而踵其後者如此，可歎已。清江皮公字其子曰昭德，其師名其讀書之齋曰學。從吾游，請以尊德性、道問學更其篇名，合父、師所命而一之。意而父所命，天所命也，學者學此而已。抑子之學詞章則云至矣，記誦則云富矣。雖然德性無預也，姑置是。澄也鑽研於文義，豪分縷析，每猶以陳為未精，饒為未密也。墮此科臼之中，垂四十年而始覺其非。以子之請，惕然於歲月之已逝，今之語子，其敢以昔之自誤者而誤子也哉。自今以往，一日之內，子而亥；一月之內，朔而晦；一歲之內，春而冬，常見吾德性之昭昭，如天之運轉，如日月之往來，不使有須臾之間斷，則於尊之之道，殆庶幾乎。於此有未能，則問於人，學於己而必欲其至，若其用力之方，非言之可喻，亦味於《中庸》首章、〈訂頑〉終篇而自悟，可也。夫如是，齊於賢，躋於聖，如種之有穫，可必其然也，願與子偕之。若夫為是標榜，務以新美其名而不務允蹈其實，是乃近代假託欺誑之儒，所以誤天下誤國家，而自誤其身。使異己之人得以藉口，而斥之為偽學者，其蔽又浮於朱學之外而子不為是也。

《心經附註》亦節錄此文，末尾程篁墩按語說：

慈溪黃氏、臨川吳氏皆私淑考亭而與聞道者，其公誦又如此，則知其知之真、見之的，誠若有天相其間，而不使斯道之終晦于天下也。學者于此痛心刻骨，以朱子為師，而輔之以學問，先之以力行，堅之以持守，俾空虛者反就乎實，卑近者上達于高明，則聖門全體大用之學，或庶幾焉。而此經所據，亦不為空言矣。

繼承吳澄的學說，敘述朱、陸和會的觀點。

朱門末學於學徒有不良影響而主張朱子學訓詁化的消極作法。吳澄於八十歲時所寫的〈答田副使第二書〉^⑳說：「朱門惟勉齋黃直卿識道理本原。其次北溪陳安卿，於細碎字義亦不差。」即認可陳北溪為學的精密性。由此可知吳澄學問的本旨在於「朱、陸之教一也」（同上）。即不持朱、陸異同的立場，而是主張朱陸折衷、朱陸融會的。

五

吳澄首度出仕元朝是在大德 6 年五十四歲時，但是當時代任者已經上任，一到京城就立即返鄉。其後三次至京師。在四次任官中，幾乎都是立即辭官，最長的也不滿三年。第二次到京師是在至大 2 年六十一歲時，授命為從仕郎國子監丞，5 月至京城，6 月上任，同年稱疾辭官。是時，吳澄憂心許衡以來，喪失朱子小學的精神，以致學者日益荒唐，但圖私利而已，乃謀求振興之策，因「才質之高下，聞見之淺深」而適切施教，學徒一時奮起。第三次上京是在至大 4 年六十三歲時，授任文林郎國子監司業。翌年皇慶元年正月去職。據〈年譜〉所載，是與同列議論不合，「遂有去志」。〈行狀〉則說「議者」以吳澄為「陸學」而斥去。《元史·吳澄傳》說：吳澄於皇慶元年晉昇司業，然「議者」以吳澄為「陸氏之學」而排去之。〈神道碑〉的載記則是：仁宗即位而進之「司業」，吳澄作「教四條」；以見嫉於同列，未實行而去職。當時：

六館諸生，悵悵如失父母者，有不謁告，從之而南者。居數年，然後歸。歸皆取高科為名士。

即盛稱吳澄不僅對南人學徒有影響，北人學徒也對吳澄尊崇備至。〈行狀〉更具體地指出：

遊先生之門，南北之士，前後無慮千百人。

第四次上京則在至治 3 年，以授為翰林學士、大中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之故，時年七十五。是年 5 月上京，6 月任官。翌年泰定元年 2 月，開設經筵。3 月，於明仁殿為泰定帝講經。7 月，編修《英宗皇帝實錄》。泰定 2 年正月朔日，以病不能早朝面聖。閏月，翰林國史院開設，纂修《英宗皇帝實錄》。以漢人「承旨」欠闕之故，吳

^⑳《吳文正公集》卷 3。

澄總理其事。2月，再度進講。8月，《實錄》完成，稱病罷官。12月，還家。3年，授命為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吳澄上表辭謝，至死不再仕宦。時年七十八。其後致力於經書的注釋。八十一歲時完成《易纂言外翼》，八十四歲完成《禮記纂言》。元統元年6月歿，享年八十五歲，封臨川郡公，與許衡同諡文正。

吳澄仕宦元朝的歷程頗為曲折。最初友人程鉅夫受詔至江南訪求遺賢，吳澄毫無出仕之意，僅以遊覽中原名勝之名上京而已。其後隱居布水谷，鑽研經學，志在承繼朱子的精神。此間，經執弟子禮之元明善的介紹，相識董士選（1253-1321）。在董士選強力勸誘下，吳澄乃出仕元朝。董士選為北人，任御史中丞，其不僅對吳澄有極大的影響，也頗盡力拔擢吳澄門下。李紱說：

其得力於吳文正公之教深矣。至於崇書院，禮名儒，全虞、元二子之交，其有助於吳文正門牆之功甚大。蓋儒臣之賢，有元公卿未之或先也。³⁸

據《元史》卷156〈本傳〉的記載：董士選「風采明俊」，對皇帝直言無諱，頗得皇帝的信賴。其父仕世祖，世祖暱稱之為「董大哥」。其自身則被成宗稱為「董二哥」。可見父子二代皆深得元王朝的信任。推薦吳澄的當時，董士選甫拜命為御史中丞。吳澄或能拒絕程鉅夫的引介，要辭退大臣的推薦則有所不能。元明善為董士選的賓客至交，以故董士選亦師事吳澄。

吳澄八十五歲的生涯中，出仕元朝的時間不過區區數年而已，其餘則僻處江南之地，窮其精力於經學與理學的研究，即以「聖賢之學」為志向，以成為豪傑之士為職志。故後人稱揚：「（吳澄）官止於師儒，職止於文學。」但「旋進旋退」，時間很短。其大半的歲月是僻居鄉陋，孜孜於理學。「研經籍之微，玩天人之妙」。他早年校注《五經》，晚年成《五經纂言》³⁹。

關於吳澄學問的宗旨，全祖望以為草廬師事程紹開，程氏嘗開設道一書院，主朱、陸融會，故吳澄的學問「本為朱學，其後兼主陸學」。然則就吳澄著述的態度，仍接近於朱子。針對全祖望如是的論述，黃百家說：

幼清（吳澄）從學於程若庸，為朱子之四傳。考朱子門人多習成說，深通經術者甚少。草廬《五經纂言》有功經術，接武建陽，非北溪諸人可及也。

³⁸ 《陸子學譜》卷18。

³⁹ 《宋明理學史》，卷上，第2編〈元代理學〉，第26章〈饒魯與吳澄的理學及其歷史地位〉，第2節〈吳澄的道統論與經學〉。

黃百家以吳澄為繼承朱子學的傳統，其經學的著述即接續朱子者。至於〈答田副使第三書〉所謂吳澄先教主一持敬的尊德性，而後鑽研讀書窮理的道問學。黃百家案語說明如下：

草廬嘗謂「學必以德性為本」，故其序《陸子靜語錄》曰：「『道在天地間，今古如一，當反之於身，不待外求也。』先生之教以是，豈不至簡至易而切實哉！不求諸己之身，而求諸人之言，此先生之所大憫也。」議者遂以草廬為陸氏之學云。

即吳澄亦有宗尚陸學的所在。王梓材說：「是卷多仍黃氏之舊。」《五經纂言》中最後完成的《禮記纂言》是在八十四歲時。〈答田副使第三書〉中說：「澄自幼務學用功六十餘年，今年已八十。」可見此書信也是晚年所寫的。前述全祖望的小序乃綜合黃百家上述的兩個見解而成的。全氏雖然受到〈陸氏學案〉的影響甚深，卻未必完全採信李紱所謂吳澄私淑陸學，吳澄之學即陸氏之學的論斷。由此可知，全祖望不定於一尊，盡其可能地排除門戶的偏見，而從吳澄全部的著作，實證客觀地評述吳澄學問的宗旨。

全祖望序《宋元學案》卷 94 〈師山學案〉說：

繼草廬而和會朱、陸之學者，鄭師山也。草廬多右陸，而師山則右朱，斯其所以不同。

王梓材說此卷乃全祖望特別撰述的。

鄭師山說：

近時學者，未知本領之所在，先立異同，宗朱則毀陸，黨陸則非朱，此等皆是學術風俗之壞，殊非好氣象也。

所謂「學問之本領」乃是不執著朱、陸異同的門戶之見，務聖賢之道的實踐，即究極朱、陸的融會。此即虞集所謂的朱、陸二家於斯道互有發明，皆可見其全體大用之盛，朱、陸二家門人之區區異同相勝之淺見誠不足論的見解。此亦即吳澄與鄭師山脈絡相承的所在，彼苦心經營學術之跡，於此明晰可見。

歷來或以吳澄的學問為朱學，或以為陸學，或以為朱、陸融會而「宗陸背朱」，眾說紛紜不一。實則吳澄學問的宗向，以其高弟虞集所謂的「朱、陸和會」的觀點理解最深，而全祖望實證性的評價最為妥當^④。

^④ 虞集：〈吳公行狀〉（收於《道園學古錄》卷 44）說：

孟子歿，千五百年而周子出。河南兩程子為得其傳。時則有若張子，精思以致其道。其迥出千古，則又有邵子焉。邵子之學既無傳，而張子之歿，門人往往卒業於程氏。程門學者篤信師說，各有所奮力，以張皇斯道。奈何世運衰微，民生寡祐，而亂亡隨之矣。悲夫！斯道之南，豫章、延平高明純潔，又得朱子而屬之，百有餘年間，師弟子之言，折衷無復遺憾。求之書，蓋所謂集大成者。時則有若陸子靜氏，超然有得於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旨。其於斯文，互有發明。學者於焉可以見其全體大用之盛。

又〈送李擴序〉（同上卷5）則比較元初傳朱子之書，有聖賢之學而為元人所知聞的許衡與吳澄的學問說：

嗚呼！文正與先生學之所至，非愚陋之所敢言也。然而皆聖賢之道則一也。

虞集以為朱、陸皆繼承孟子的傳統，許衡與吳澄則皆廣繼聖賢之道。虞集之論，蓋可窺見吳澄「朱、陸之教一也」，即朱、陸融會的思想。錢穆稱虞集的〈行狀〉可謂「得草廬之心志」，而批評「後世論學者，乃以草廬為調和朱、陸，或竟以為陸學，則殆所謂皮相之見也」（收於〈吳草廬學述〉，《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六））。狩野直喜則說：「彼（吳澄）為陸學，然決非奉陸背朱，乃調和朱、陸者也，人輒以朱、陸為相對者，其實不然。」（《中國哲學史》，岩波書店）誠為知人之論。全祖望《宋元學案·草廬學案·序》，雖非簡潔明快之文，而在文獻資料的廣泛蒐羅上，做實證性的結論，則是其長處。陳高華說：

採朱陸調和的態度而最著名的人是吳澄、鄭玉〔……〕除了吳澄、鄭玉之外，虞集、趙汙等人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對朱、陸二家採取調和折衷的態度〔……〕吳澄、鄭玉、虞集、趙汙等人在元代思想文化界有很高的地位，他們的態度說明了，陸學在元代的影響還是相當大的〔……〕在有元一代思想領域中，真正比較值得注意的不是朱學，也不是陸學，而是朱、陸混合的潮流。（〈陸學在元代〉，《中國哲學》第9輯，1983年2月。）

乃繼承全祖望的見解，強調元代學術思想的主流是朱、陸和會。《宋明理學史》卷上也持相同的看法。

楠本正繼於所著：《宋明時代儒學思想の研究》第2章〈元代儒學〉論述元代形成「朱、陸折衷」風潮的原因說：「朱子之學大行，又為世人所尊信，終造成陸學的衰微。因此所謂習合、折衷之風氣興起。」

在究明吳澄的學術思想的過程中，理解全祖望《宋元學案》的敘述最為可信，是一大收穫。錢穆曾說：

治理學者，必治黃、全兩《學案》。梨洲《明儒學案》，雖主王學門戶，然不為病。因述明儒，固當奉王學為宗主也。謝山《宋元學案》，考覈有功，而識斷多差。上承梨洲父子，見解已多為門戶所蔽。又謝山與李穆堂相交，受其濡染，門戶意氣，未能盡脫。本書隨宜駁正謝山《學案》處甚多。因《宋元學案》，學者必多窺涉，加以指駁，亦不得已。王白田《朱子年譜》，近世學人多稱之，然亦勤於考覈而拙於體會。並亦為門戶所蔽。（《朱子新學案》第一冊例言）

即《宋元學案》的問題比《明儒學案》多。的確全祖望不但受到王學學者黃梨洲父子的影響，也受到陸、王學者李紱的影響；但是全祖望未必完全蹈襲李紱的學說，甚且頗致力於門戶之見的排除。關於「門戶之見」，〈宋元學案刊例〉如下敘述著：

初觀是書，似有門戶之見。細閱梨洲、主一以及謝山諸案語，往往和會諸家，總歸聖道之一。但既各為學案，不得不標其門人私淑與再傳、三傳之派別，亦由體例使然。而宋、元儒諸派傳授，尤紛然錯出，故細為標目，初非有門戶之見也。

吳澄朱、陸和會的主張，是在當時思想大勢中產生的。宋末朱子的理學盛行天下而陸學呈現出衰退的現象。即使是陸象山的故鄉，也由於朱子高弟黃榦鼓吹朱子學，朱子學乃為該地的主流思想，吳澄即受到此學風的影響，其學問乃以朱子學為出發點。再者，以楊簡、袁燮為宗而陸學盛行的浙江四明（寧波）一帶，到了南宋末年，由於黃震、史蒙卿、王應麟等人的提倡，此地也逐漸流行朱子學。元代雖有信奉陸學的劉壘（1250-1319）、陳苑（1256-1330）、趙偕（?-1364）等人宣揚陸子學，但是天下學術仍然是以朱子學為主導。在此學術大勢下，吳澄首先習染的即是朱子學。雖然如此，吳澄頗不滿於朱門末學著重訓詁（即朱學訓詁化）的流弊。再者，元朝雖以朱子學為官學，許衡所揭示的朱子學逐漸喪失朱子原本的精神，而墮於以利益為優先的俗學化。由於朱子學的訓詁化與俗學化的關係，吳澄雖然傾注心血於朱子學的研究，卻始終沒有以朱子學為唯一絕對的學問，即未抱持門戶之見，獨尊朱子學。再者，陸象山不但是鄉里先賢，早歲以來即認為其學並無流俗化的弊端。陸子與朱子為同時代的學者，所主張的道卻不相同，以此而深為困惑。二十二歲與程紹開相識以後，始知陸學的本質，而逐漸走向朱、陸融會的學問路數。雖然如此，吳澄不滿朱門末學的同時，對當時的陸學也有批評。吳澄說：

今之口談先生、心慕先生者比比也，果有一人能知先生之學者乎？果有一人能為先生之學者乎？^④

又說：

陸先生之學不在乎言語文字也，〔……〕蓋先生平日教人專於心身上切實用功。^④

但是當時學者：

談陸之學，往往曰以「本心」為學，而問其所以，則莫能知陸子之所以為學

最近出版的《中國歷史大辭典》的《宋元學案》的說明指出：

比《明儒學案》好。〔……〕提供讀者自己判斷的材料。

強調並贊賞《宋元學案》的文獻廣博與實證性的立論。錢穆也賞譽《宋元學案》的〈草廬學案〉說：

王梓材謂是卷多仍黃氏之舊。余嘗編繙《草廬全集》一百卷，其中要義，黃氏采摭殆盡。前儒讀書謹密，即此可見。本文自抒觀點，稱引多出黃氏外，然不害黃氏此一選擇之精審，讀者其兼觀焉，可也。

④ 《吳文正公集》卷10，〈象山先生語錄序〉。

④ 同註④，卷11，〈金谿傅先生語錄序〉。

者何如？是「本心」二字徒習聞其名，而未究竟其實也。^{④③}

即感歎當時的陸學也淪為以訓詁為主的訓詁化學問。至於自身早歲所困惑的朱、陸殊途的原因所在，吳澄分析說：

（朱、陸）二師之為教一也，而二家庸劣之門人各立標榜、互相詆訾至于今，學者猶惑。嗚呼甚矣！道之無傳而人之易惑難曉也。^{④④}

即由於朱、陸二門的思想混淆不通，故有困惑，而對此學術現象，更深以為憂。吳澄以為朱子之教的根本在於「讀書講學」，陸子則在「真知實踐」。「讀書講學」為「真知實踐」的根本，「真知實踐」必由「讀書講學」入。故「朱子之所以教，亦陸子之所以教也」^{④⑤}。即其究極乃是一致的。

吳澄對朱、陸二子之學，不但毫無門戶異同的偏見，甚且超越朱學、陸學，即所謂學問派別分際範疇，故其學術思想的性格極其精深博大。其以傳統儒學及其經典的研究著述為核心，旁及《太玄經》、《老子》、《莊子》的疏解，又受到精曉天文曆算的祖父吳鐸的影響，尊崇邵雍為孔子以來的偉大學者。綜觀吳澄的學問，不但打破朱、陸門戶異同的偏見，更超越當時朱、陸二學訓詁化、俗學化的流弊，開拓寬廣的學術視野，走向朱、陸融會的理學研究新領域。

吳澄頗尊崇元朝朱子學者許衡。吳澄說：

澄不及識許公，然頗注意於朱子之學。它日，侯為澄誦所聞，其必有不期同而同者。^{④⑥}

又說：

章懷許文正公尊信《四書》、《小學》書以教，而國朝士大夫始知有朱子之學。帝制以十賢從祀孔子廟，後學躍然有所興起。順中白其父市地於洛城宣仁門之北，構祠屋，祠十賢，以致嚴事之誠。其次以邵、周、司馬、張、程、朱、張、呂、許為序，蓋以齒之長少、時之先後定也。來京師求文以記，予謂順中，庶士也，有志尊慕聖賢之學，可嘉也。夫果能遵許文正之教，而上達於司馬，以行天下之達道，循朱、張、呂之言，而上達於程、張、周、邵，以

^{④③} 同註④①，卷 48，〈仙城本心樓記〉。

^{④④} 同註④①，卷 15，〈送陳洪範序〉。

^{④⑤} 同前註。

^{④⑥} 同註④①，卷 22，〈儼齋記〉。

立天下之大本，此實學也。^{④⑦}

吳澄交友甚廣，自詩人、琴士、畫師，以迄道士、相士、卜師者流。即不僅是儒者，道教、佛教人士也有交往，其應對酬酢的文章也極多。吳澄超越學派的門戶之見，多方交友而以「聖賢之道」為究極的學問宗尚，乃為明代陳白沙、王陽明解脫學問流派的束縛，建立新學思想傾向的先驅^{④⑧}。

原載《九州大學文學論輯》第 32 號（1986 年 12 月），頁 17-46。

^{④⑦} 同註^{④①}，卷 41，〈十賢祠堂記〉。

^{④⑧} 唐宇元的《吳澄》（收於《中國古代著名哲學家評傳》）說：

吳澄與後來的王學或王學的前驅人物吳與弼、陳獻章等人，並無直接的師承關係，但從其思想的前後脈絡來看，其間是有蛛絲馬迹可尋的。這裏要提出的問題是，在朱熹之後，不僅在元代的吳澄，即是在吳澄之前的饒魯、程紹開，以及與吳澄同時的元代一些「南方之儒」，他們的思想也多是和會朱、陸而趨於陸。雖然他們當中的不少人，本是朱學的傳人，但他們的思想發展為什麼會出現這種趨向，以至到明代產生了王學？這個問題，是不能簡單地以所謂由支離繁瑣的朱學勢必要趨於簡易直接的王學所能解釋的。

乃重新提出一個值得審慎思考的問題。